

■聚焦“70后”

一座通往成熟的渡桥

□周燕芬

女作家周瑄璞是从写长篇小说起步的。她在创作之初就一口气写了四部长篇,不仅靠胆量和勤奋,也靠她良好的文学感觉和一上手就纯熟老到的文学表达。文学征程的路径因人而异,文学史上不乏起笔长篇转而中短篇的成功作家,周瑄璞近两年也放下长篇专攻中短篇,她在全国知名刊物上陆续推出一系列小说佳作,不但刷新了读者以往的阅读印象,还引发出对她未来文学成就的梦想和期望。

阅读这些小说,我们发现周瑄璞还是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她所熟悉和擅长的都市女性生活题材,但作家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中短篇小说对生活的把握、对情感和思想的传达,是大异于长篇创作的,中短篇是更讲究内在思想含量和情感浓度的艺术形式,包括语言的张力和韵致。所以我们通过这两组小说,可以更切近地读出初步自信的小说家对人生、对世界和对小说写法的进一步思考。

周瑄璞的这一组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写实的,对都市底层生活细致绵密的状写,对女性精神世界的独到探索与发现,可见到作家的用心有力。这里用三个关键词来解读周瑄璞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内涵。

一是自尊。自尊是一种直面世界并审视自我的精神姿态,对于作家来说,是心智成熟和自信确立的表现。《曼琴的四月》中的曼琴、《流芳》中的流芳、《失语》中的李兰心,她们出身卑微,相貌平常,处境艰难,但却共同私藏一个美好的理想,哪怕多么谦虚和渺小,但终归是理想。她们或者深陷一段非常态的爱情,或者苦心经营着不堪的家庭生活,她们都没有抵达她们向往的幸福彼岸。幸福之于女人,幸运者触手可及,不幸者却遥不可期;但令人惊异的是,正是这些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女子,几乎在用自己生命的全力追求着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过程,并在心灵深处坚守着一块尊贵的精神领地。尊严之于人尤其之于女人的重要,在周瑄璞小说中是被放大和强化的,这使得取材于现实的小说和小说中的人物又超脱于现实之上,成为人生和人性理想的承载体。于是,周瑄璞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作家别样的情感体验和自觉的理性思考中,呈现出特别的气质样貌。她们挣扎于都市底层,被生活的压力所逼迫,但内心的梦想却给了她们巨大的精神支持,使她们挣脱尘俗,拥有美丽而澄明的心灵花园。曼琴和流芳,安静从容的外表包裹着内心的不安宁。她们敏感、自尊并顽强,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修改眼前的不如意,追求和建造自己心目中质量的生活;李兰心和《与爱情无关》中的“我”,则在梦想破灭之时,决绝地离开甚至舍弃生命,以维护自己的情感尊严。好的小说就是要回答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命题,有尊严地活着就是这个命题的第一要义,人的尊严在才会有小说的尊严,在周瑄璞以文学精神的高标,将自己的小说与一味渲染“私人化”和“欲望化”的都市写作区别开来。

二是反叛。特殊的精神气质和人生追求,让周瑄璞小说里的女性显得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外表的温顺和内心的坚贞不屈形成巨大的反差。周瑄璞笔下的反叛性格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长性叛逆或者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而是人物凸显的自我意识与外在社会成规和习见之间的不融洽、不协调,是性格中类

似生命基因一样顽固存在的“另类”和“拧巴”,无法简单判定对错和美丑。比如《曼琴的四月》中的曼琴,从里到外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正派甚至古板;而她母亲却不干净也不正派,随时会丢下家和孩子跟了情人跑,父亲不是被女儿目睹奸情就是嫖娼被抓。曼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守着贞洁,直等到31岁才如愿结婚。曼琴从懂事起就与这个不洁不美的世界对抗着,很倔强、很执拗。曼琴的母亲其实也是一个叛逆者形象,她离开一个正常女人的人生轨道,置亲情责任和道德伦理不顾,飞蛾扑火般地追逐自己的生活理想。曼琴的母亲是周瑄璞塑造出的一个很不寻常的女性,也是思想意涵丰富的文学形象,曼琴和她的母亲站在这个世俗世界的两个端点,各自坚守着她们的精神领地。

《失语》写了一个很特别的三角恋爱,杜长征单恋李兰心,是那种不停歇的单恋,而李兰心却无私无畏地爱着另一个隐身男人。这段不能走在阳光下的爱情侵害了李兰心的全部身心,连她所挚爱的诗歌都不能解救她。小说把女性陷于爱情而无视他人和世界存在的那种心灵状态描摹得非常到位。《与爱情无关》其实皆与爱情有关,关于爱情的不可控制和不可维持,关于爱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硬道理”,小说几乎在引领读者思考爱情本体问题了。穿过女性的爱情痛感和她们无助无望的心灵,我们在这两篇小说中也读出了性别文化的冲突,读出了女性和男性既扭结纠缠又警觉抗拒的复杂心理状态。

周瑄璞不像有些写实的作家止步于呈现世界的荒谬和生存的困境,这些底层女性处境艰难惨淡,但她们不屈从这样的人生命运,不认同这样的生活逻辑,作家开掘出弱小女性内心的欲望和力量,写出她们面对现实不愿和解、不甘妥协的抗争精神。这种反叛的姿态或许过于自我,过于任性,结局必然是陷于绝望,甚至毁灭自身,但女性用瞬间的生命亮色抗拒永无出路的黯淡人生,这让我们在周瑄璞平实淡定的叙述中体味出激荡于作品深层的女性主义气息。周瑄璞在呈显女性边缘化和被压抑的悲剧命运时,在敞开女性的情感世界和生命欲求时,摒弃了简单的道德伦理审视,这便拓展了小说的思想疆域,让人联想、思索并有新的领悟。

三是温情。周瑄璞小说中自尊与反叛的女性,并无孤高和冷漠,因为她们是底层市民,要靠相互温暖相互支撑来应对人生。如果说她们与外界的格格不入是因为她们特殊的精神追求,那么身世血缘、家庭亲情又将她们与凡俗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曼琴和流芳好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精神世界里不屈不挠的梦想只有自己知道,现实世界里她们普通平常,集温情、宽容和忍耐的品质于一身。曼琴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陪了母亲,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操持那个混乱的家庭;流芳“对生活交付给她的一切表示顺从和尊重,她从不哭闹不吵,因为她知道这样没用”;她们知道,只有从容面对、勇敢承担,才有可能一点点接近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目标。曼琴和流芳们既非知识女性,也非白领大资,甚至连漂亮女孩都算不上,在现代都市,她们好像什么都不算是,但在浑浊庸俗的市民生存空间里,她们又是那样清新脱俗,那样与众不同。自我生命体验决定了周瑄璞对世俗生活价值的认同、对市民生活方式的亲近,但她又善于发现和把握这一类普

通女性的精神亮点,善于写出她们身上那种“吸引人的东西”。从她小说中走出的女性,个人标记性很强,这是周瑄璞写作成功和有意义的地方。

普通人身上的诗品固然是很“吸引人的东西”,但更让人为之动容和感怀的,还是人性中的温情暖意。《在一起》和《失语》两篇写的是男人的故事,杜长征和刘雪城所具有的温厚善良、在亲情和爱情上的忍耐和担当,代表了市民社会中正面的、理想的男性形象。无论生活多么惨败、多么水深火热,也不能没有亲情没有爱,亲情和爱就是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这是底层人的幸福准则。正是扯不断的生命情缘战胜着人性的弱点,彰显着动人的力量。而此时的女作家也会情不自禁越过高处立场和理性姿态,动用她善感的心灵和柔软的笔触,书写出人世间的脉脉温情,并将其升华为支撑苦难人生的坚强信念。

周瑄璞的另一组短篇小说看上去更工于小说写法,试图以技术的自觉来谋求小说艺术的突破。不排除作家的艺术探索中有形式实验的意图,因为这些短篇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方法各有不同,显得变化多端。比如《关系》有完整的情节,属于生活写实辅以心理流程的方法;《通道》则以更为简洁的对话构成本文,更多穿插和跳跃,丰富的思想和情绪沉潜在人物台词之下;《圆拐角》平实的叙事中暗藏玄机,人物的情感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如同小说的名字一样,缓缓地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种情绪的跌落,让人嗟叹不已;《西安闲人》通过“艾的风流史”,折射出现代人的情感状态;《隐藏的力量》借用GPS科技手段来跟踪定位都市人隐秘的心灵世界,堪称奇妙的构想;《移情别恋》用的是自由联想式的叙述,生活的无序状态和人物心绪的杂乱状自然呈现;《小巷臆想症患者》基本以内心独白为小说的主体内容,意识流的结构手法纯熟流畅。不能说这些短篇小说的形式构造与内含的思想情感之间都是严丝合缝的,叙述方式的刻意求新有时难免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但是,对形式感的自觉、对艺术表现多种方法的尝试,通常也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周瑄璞正走在创作的自我超越阶段,她已经脱开了早先表现理想遭遇现实挫折的青春躁动性叙事,近年的中短篇创作证明着她新的成就。判断一个作家是否走向成熟的标记是多方面的,语言作为文学安身立命的所在,应该最能考验出作家的写作功力和未来前景。从以上中短篇小说来概括周瑄璞的语言特点,首先是从容不迫地还原生活的文字能力,流水式叙述张弛有度,具有贴近生活和人物本身的语言质感,不惊不诧、娓娓道来的,却极具渲染性。其次是叙述中情绪非常饱满,语言的主观操控感很强,因此能把握住小说的气韵格局。第三,富于智性与幽默。在周瑄璞的小说中,幽默俏皮的句子俯拾皆是,并且自然而然地流淌在叙述当中。有些表现为底层小人物无奈的幽默调侃,有些是作家主观性的自嘲和反讽,具有揭示现实和人性真相、思考时代和社会心理,以及自我审视的意义功能。幽默是一种个性化的笔调,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作家要有足够的自信心足够的宽松心态,而且有足够的掌控小说语言的能力,才有可能表现出幽默自嘲的审美风度。周瑄璞语言的这一自觉追求,为小说增色不少,甚至已经成为她创作迈向成熟的重要标记。

■关注

文学市场的发育成熟和大规模拓展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最为显要的标志性变化。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出版商与媒体对“80后”文学的青睐与推崇,并非基于对“80后”写作的文学意义的认同,而是将目光瞄向了其背后的庞大的文化市场和强大的消费力。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春树、胡坚、孙睿、笛安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在图书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始终没能得到主流文学批评界的认可。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被市场裹挟的“80后”文学依托着市场运作的强大动能,撇开主流文学批评的规训,游离于主流文学体制之外,呈现出非常规发展的状态。主流批评界对“80后”文学的态度冷漠与暧昧,更多的批评家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冷眼旁观的态度。大而化之,提些不痛不痒的意见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严肃而有效的、对“80后”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的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80后”文学的畸形发展,这不能不说也是文学批评的失职。“80后”文学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文学的缺陷和不足,迫切地需要文学批评的引领,经历了市场洗礼的“80后”文学急需建立一个完整而健全的文学生态环境。

事实上,与“80后”文学相关的评论文章数量并不少,市场化运作的需要催生了大量为其造势的媒体批评。如果说批评对文学的引导可以分为创作与读者两个层面的话,这些汗牛充栋的媒体批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但这些批评却无法替代真正面对“80后”写作本身、探寻文学本体价值、对创作具备指导和引领意义的文学批评。和作家一样,批评家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决定了其文学观念、批评风格、审美标准和艺术旨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们与同龄的成熟作家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时代记忆、生存经验情感体验,有着可以直抵心灵的精神通道与牢固坚实的对话基础,不存在因年代不同所形成的沟通与理解的障碍;因此,他们对同代的那些创作实力雄厚、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平、可供研究和阐释的空间也较大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既顺理成章也卓有成效。而“80后”们是真正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被打上了深深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烙印,其思想、观念、个性、阅读、语言、表达方式等都与上几代人不同。作为早熟的一代,“80后”作家进入文学写作的时间较之父辈作家们大大提前,其题材大都集中于写校园、写青春、写恋情,而且语言风格大都唯美华丽,略带感伤,且带有强烈的自恋意识。他们与父辈批评家们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代沟,导致了批评缺乏进入到“80后”文学的深处与细部的有效途径。

因此,无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现实格局,还是“80后”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都强烈地呼唤“80后”文学批评家的崛起。“80后”作家群体中的部分佼佼者已经脱颖而出,在新世纪中国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而“80后”的批评家队伍还尚未成型。在当前的大学中文系里,存在着大量的“80后”准批评家,他们大多处于硕士与博士学历层次,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学院派批评的专业训练,有着较为纯正的文学感觉和扎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他们与“80后”作家们有着共同的时代记忆、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和思想基础,他们的文学生命也多半与“80后”文学创作同步成长,对“80后”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独异的精神气质、个性风格、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审美取向、艺术技巧等有着亲近的感受力和天然的领悟力;对“80后”文学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和生活,有着真切的生命经历和鲜活的情感体验,因而更容易切入到“80后”文学本体的深层次肌理,更有可能探寻和阐释80后文学的价值和文学意义。

在我看来,“80后”文学的起始和源出其实是青春写作,即13岁至19岁的中学生们,在青春期的迷惘与躁动之下,选择了文学作为宣泄情感、缓解压力、排遣孤寂、交流思想、施展才华的精神家园。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在“成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空白地带,中学生题材被我们的主流文学忽略掉了。因此,当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启了一个课堂之外、属于中学生们自己的独立而自由的文学空间时,当少数获奖作者在媒体的渲染之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年轻人的新偶像时,一个数量庞大、且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年轻群体的文学激情被迅即点燃,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说青春资源是“80后”文学最重要乃至唯一的写作资源,“80后”作家们的青春期体验与前辈们所形成的巨大断裂,成就了他们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表达。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青涩单纯的少年们如今大多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有的甚至结婚生子为人父母。“80后”早已不再是单纯、幼稚的代名词,曾经属于“80后”的一张张标签已经顺其自然地让给了正在成长中的“90后”们。“80后”文学作为一个代际命名,其文学概括性正在逐渐散失。

正像在汶川抗震救灾中,“80后”们的优异表现改变了全社会以往对“80后”缺乏社会责任感、欠缺行动力、心理素质差等负面认识一样,逐渐走向成熟的“80后”文学内部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80后”作家的逐渐分化也使得“80后”文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我看来,当“80后”文学作为一个代际命名,其文学概括性正在逐渐散失,那么用“后青春文学”来描述当下“80后”文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似乎更具文学的合法性。与前期主要依托网络传播、商业出版、文学市场的发展模式不同,当下的“后青春文学”呈现出对主流文学的价值一定程度的认同和向传统文学发展轨迹的归趋趋势。既往印象中的“80后”作家群已经不复存在,很多偶像派写手或固守商业化写作模式,或逐渐淡出文坛,更多的不为人知的年轻作者突破了商业文学机制的遮蔽逐渐浮出水面,坚守文学理想的青年作家已经或正在摘掉青春的面具,转而寻求对更为深邃辽阔的生活场域的展示和对更为深沉高远的思想境界的建构。伴随着青年作家的成长、成熟,情感体验更为微妙复杂,思想主题更为深刻,“后青春文学”将逐渐渗透并融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并展示其独特的文学本体意义。

■第一感受

杨葵在胡同口聊天

□沈嘉禄

■看小说

郝炼《淑婷》 在生活的拐弯处

当我们在生活巨大的惯性作用下快速滑行、且行且远的时候,或许早已经忽略了路边一掠而过的风景。《淑婷》(《时代文学》2012年第3期)的主人公中学老师淑婷工作多年的学校被合并之后,调到另一所重点中学当了仓库管理员。生活境遇突如其来地改变,仿佛一个路障,迫使她在惯性滑行中稍作停顿。自此,淑婷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发生变化的,还有她看待生活的方式。当最初的失落、惆怅、迷茫乃至怨忿渐渐平复之后,她在新的生活角色中似乎看到了新的生机,品出了新的未曾尝试的意味。这停顿仿佛一个契机,令她从之前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打量自己的来路,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仅仅是更换一个位置和角度,世界原来可以如此迥然不同。她蓦然发现,之前一直被遮蔽被忽略的风景、一直熟视无睹习焉不察的人和事,竟是心中最柔软最疼痛的部分。然而,正当她有所顿悟,逐渐习惯并享受当下生活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却又发生了。淑婷究竟该何去何从?很多时候,生活真是身不由己。小说以安静舒缓的笔致,把一次生活中的小转折戏剧化地表现出来,气定神闲,颇为难得。

陈蔚文《惊蛰》 挑开婚姻的柔软面纱

惊蛰这天,家庭主妇姚开芝偶然发现,一向以为行驶平稳的婚姻之船触礁了。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中炸响的春雷,宣告了这个家庭温和气候的结束。阴郁烦恼的“雨季”气势汹汹而来,令婚姻中的男女不胜其烦,左冲右突,欲寻求突围而百般不得。小说《惊蛰》(《上海文学》2012年第3期)围绕家庭内外的矛盾纠葛徐徐展开,以锋利的笔触,把婚姻的柔软面纱豁然挑开,呈现出令人触目惊心的表情,展现了婚姻的光滑外表之下千疮百孔的内核。婚姻生活中的褶皱与起伏、曲折与幽暗、隐私与暧昧,种种情形,不足以外人道,在女性作者纤细敏锐的透视下,虽琐碎庸常却细腻入微。小说写出了现代婚姻中真实的两性关系,其间的对峙、较量、相持以及妥协与和解,皆深刻表达出婚姻的本质和情感的悖论,令人心悸之余,慨叹百端。或许,这对夫妇终究是没有出路的,除了信守当初的诺言,在属于两个人的围城中挣扎辗转,困守一生,直至终老。也或许,他们会痛断前缘,带着满怀伤痛劳燕分飞。然而,即便是重新再来,谁又能够挣脱那个悖论的枷锁?小说叙事娴熟,笔调从容不迫,却情感饱满,敏锐而易感,分寸妥帖,隐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痛感。

(付秀莹)

西方现代派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内在关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当然,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和80年代文学的关联研究,确实是难度很大的,这不仅涉及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更涉及对文学思潮、文学制度、思想场域的发掘与考量。研究的复杂和难度,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王德领的专著《混血的生长:80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一书的出版,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现代派文学在80年代的接受作为一个论题来进行详细论述,可以说是填补了相关研究的一些空白。

作者认为,80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80年代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第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论争与中国文学论争。第三,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变革影响。

该书围绕这些内容,主要从宏观的文学思潮角度进行论述,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放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从对构成西方

现代派哲学基础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在80年代的译介和接受入手,围绕着中国文学为什么接受西方现代派和怎样接受西方现代派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以知识考古学式的现场发掘方式,以系统翔实的资料,详细梳理西方现代派在“文革”后至80年代的译介情况,通过分析对现代派的接受中所凸现的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以及有关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中国文学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从思潮的角度,分析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怎样参与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变革进程的。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令人瞩目。作者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的,持论公允,论从史出。作者站在新

世纪的知识立场上,在注重对80年代文学场域的还原的前提下,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文学史问题。经过作者细致的分析、绵密的资料考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现代派如何重构了80年代中国文学,80年代中国文学又是如何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走向多元的。这是一次混血的生长。如果说四五时期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混血的,这一次混血的生长,则使新时期中国文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我们呼唤踏实、沉潜、富有创见的研究,呼唤从史论、观点和材料相得益彰的研究,呼唤持论公允、有问题意识、有开拓性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德领的这部著作,其学术价值让我们看重。

『80后』文学呼唤同代批评家

文学市场的发育成熟和大规模拓展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最为显要的标志性变化。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出版商与媒体对“80后”文学的青睐与推崇,并非基于对“80后”写作的文学意义的认同,而是将目光瞄向了其背后的庞大的文化市场和强大的消费力。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春树、胡坚、孙睿、笛安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在图书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始终没能得到主流文学批评界的认可。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被市场裹挟的“80后”文学依托着市场运作的强大动能,撇开主流文学批评的规训,游离于主流文学体制之外,呈现出非常规发展的状态。主流批评界对“80后”文学的态度冷漠与暧昧,更多的批评家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冷眼旁观的态度。大而化之,提些不痛不痒的意见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严肃而有效的、对“80后”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的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80后”文学的畸形发展,这不能不说也是文学批评的失职。“80后”文学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文学的缺陷和不足,迫切地需要文学批评的引领,经历了市场洗礼的“80后”文学急需建立一个完整而健全的文学生态环境。

事实上,与“80后”文学相关的评论文章数量并不少,市场化运作的需要催生了大量为其造势的媒体批评。如果说批评对文学的引导可以分为创作与读者两个层面的话,这些汗牛充栋的媒体批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但这些批评却无法替代真正面对“80后”写作本身、探寻文学本体价值、对创作具备指导和引领意义的文学批评。和作家一样,批评家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决定了其文学观念、批评风格、审美标准和艺术旨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们与同龄的成熟作家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时代记忆、生存经验情感体验,有着可以直抵心灵的精神通道与牢固坚实的对话基础,不存在因年代不同所形成的沟通与理解的障碍;因此,他们对同代的那些创作实力雄厚、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平、可供研究和阐释的空间也较大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既顺理成章也卓有成效。而“80后”们是真正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被打上了深深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烙印,其思想、观念、个性、阅读、语言、表达方式等都与上几代人不同。作为早熟的一代,“80后”作家进入文学写作的时间较之父辈作家们大大提前,其题材大都集中于写校园、写青春、写恋情,而且语言风格大都唯美华丽,略带感伤,且带有强烈的自恋意识。他们与父辈批评家们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代沟,导致了批评缺乏进入到“80后”文学的深处与细部的有效途径。

因此,无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现实格局,还是“80后”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都强烈地呼唤“80后”文学批评家的崛起。“80后”作家群体中的部分佼佼者已经脱颖而出,在新世纪中国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而“80后”的批评家队伍还尚未成型。在当前的大学中文系里,存在着大量的“80后”准批评家,他们大多处于硕士与博士学历层次,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学院派批评的专业训练,有着较为纯正的文学感觉和扎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他们与“80后”作家们有着共同的时代记忆、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和思想基础,他们的